

文化 传承

谈文 论艺

# 以高质量国际传播促进文化传承发展

王众一

### 精彩阅读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通过深入调研作出研判，再通过顶层设计带动整体升级。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大有可为，传统国际传播载体也应承担起使命职责，在深入、系统传播方面发挥优势，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聚焦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传播发展的最新成果，应该是今后国际传播的重点所在。文化传播需要更大的格局、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强的使命担当，高质量国际传播建设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亟待加强的配套工程。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此次重要讲话发表前后，5月和6月我参加的两场活动，引发了我对高质量国际传播对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思考。

5月下旬，我参加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组织的主题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调研，有机会深入地方了解当地如何借助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文旅和文创、文艺演出及文化出版等领域作出的努力与成果。对于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体现了各地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探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洋溢着不竭的创作热情。

这一切令我深受鼓舞，同时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那就是，如何在商业性开发中保持优秀文化的提炼与提升，促进其与世界对话，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比如，如果能够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角度进一步立意高深地提炼敦煌文化精神，完成其价

值的现代化提炼，并融入文创、文旅产品中去，就会使敦煌文化的呈现不仅有“美”的层面，更向“善”与“真”的境界提升，对于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整体提升无疑大有裨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通过深入调研作出研判，再通过顶层设计带动整体升级。

6月下旬，我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暨在日本发行70周年纪念活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本创办70年的杂志与读者和本土作者的血肉联系。自创刊40周年起连续5次参加《人民中国》创刊纪念活动的老读者小林泰，不顾91岁高龄，抱病撑起精神前来参加活动；青年读者山本胜巴特意携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华莲，专程从300公里外的爱知县赶来为《人民中国》70周年庆贺加油；已故专栏作者江原规由的夫人江原孔江女士因病无法来到活动现场，通过友人手机转播聆听了我的特别演讲，激动地发来感想说：我先生

有幸结识王总编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为促进日中关系发光发热，我想今天他也一定正在天上守护着我们，祝福着《人民中国》迎来创刊70周年。《人民中国》自创刊以来就对对象国读者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联系，通过读者调研，确立了人文外宣的基本定位，70年来一直对日本进行精准文化传播，系统地将中国的历史、国情、文化与价值介绍给日本受众。日本大报《日本经济新闻》曾撰文称，在众多的对日传播媒体中，全面了解中国的升级版百科全书式的期刊版本非《人民中国》莫属。这表明，真实有效的国际传播，宣传中国文化精华与中国思想价值的国际传播，可以通过国际传播期刊实现。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大有可为，传统国际传播载体也应承担起使命职责，在深入、系统传播方面发挥优势，再立新功。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对外系统性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新媒体时代，弥补碎片化、娱乐化、同质化传播的短板，真正系统深入地讲明白中华文化的道理并使之深入人心，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传统纸质版书刊的独特作用值得重新审视。我曾经在日本大阪人类学博物馆参观，工作人员把我带到馆内的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学术著作的海洋中，一排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自创刊号以来的全部《人民中国》杂志合订本。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所以重视《人民中国》这份综合期刊，就是因为它多年来介绍了丰

富的民风民俗和中国历史，许多报道如同学者的田野考察，信息量和学术价值极大，经常得到学者的学术引用。这个故事表明，这种厚重的富于信息、知识积淀特点的国际传播出版物，具有久久为功、深入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后来通过《中国的世界遗产》《北京的石头、水、树木》《东西文明比较》《美丽中国》《传家》等精品栏目依然在延续，使得《人民中国》成为国际传播期刊版本序列中的高“骨密度”刊物。

文化主体意识和跨文化转化的话语打造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关键性突破点。既有文化自信，又有文化担当；既通晓中国文化，又懂得与世界不同文化对话，这样的中国主体性人才建设刻不容缓。这支队伍的高端人才的稀缺性成为策划实施真正有效的对外文化传播的瓶颈性限制因素。中国外文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融通中外的高端人才群星璀璨的时代：比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的组合，使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权威版本的《红楼梦》英译本；在对日传播领域，公认的大家刘德有通过深厚的跨文化翻译功力，不仅成为文字翻译的佼佼者，更是为国家领导人做过出色的翻译而得到好评，并在以记者身份驻日期间深入观察日本社会与语言的变迁，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日本观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着自觉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有着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问题意识，又具有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实践能力。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中，现代国际汉学家是可以团结的力量。历史上，中国的古典文化在欧洲的传播，曾给启蒙运动带来很大的启迪。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融通古今的汉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现代汉学研究的新成果将再次给世界输送解决当下与未来问题的新启迪。要在此过程中发现、团结这样的汉学家，鼓励、支持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加强中国学者和国际汉学家的交流合作，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

## 共建教育实践基地 共推艺术传承创新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中国广播艺术团与中央戏剧学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精神，中国广播艺术团与中央戏剧学院本着“强强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将共建教育实践教学基地，联合开展艺术创作演出，共同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努力推动艺术传承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表示，近年来中国广播艺术团相继推出原创民族歌剧《莫高窟》、《二十四节气交响套曲》音乐会、民族管弦乐《国乐记忆》、相声剧《风吹水面层层浪》、大型民族交响诗《崛起》《大河九曲》等原创作品以及《非遗相声大会》品牌。特别是从2020年开始，艺术

团连续三年打造了艺术季系列演出活动，原创作品数量、演出质量和影响力均得到大幅提升，赢得广大观众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未来，中国广播艺术团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为中戏师生搭建创作展演的平台，在艺术实践中磨炼人品、锻造艺品。

“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而培育造就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央戏剧学院将携手并肩，让‘讲台’与‘舞台’更紧密地连接，创作出更多高质量艺术作品，培养出更多优秀艺术人才，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繁荣中国演艺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刘学俊说。据了解，双方将在学科建设、师资共享、文化传承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力争取得互利共赢的效果。

## 探索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

本报记者 谢颖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人类一直在试图回答的问题。从1929年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化石起至今，我国境内已有70多处遗址发现了史前人类化石。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日前，在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上，220余件（组）文物，结合各类场景还原和多媒体技术手段，生动灵活地将近百年来中国在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古DNA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现出来。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持续推进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现代人起源、旧石器时代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以愈加丰富翔实的资料实证我国的百万年人类史，为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为推动全球关于人类起源和演

化规律的认识作出了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创新贡献。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邓涛介绍，近年来，古脊椎所在国内率先将高清晰度CT、同步辐射、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图像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应用于古人类研究，革新了本领域的研究范式，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研究进展。尤其是对古核基因组捕获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使大规模研究古DNA成为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人类学、演化遗传学等相关学科发展。

邓涛表示，此次展览向公众生动展现中华大地上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历程，清晰勾勒出华夏族群演化的基本图景和各区域演进路径，系统阐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系和文明流变，帮助大家更加深刻地感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丰富内涵。

## “濠江之春”架起艺术交流桥梁

本报记者 杨雪

近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指导，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新疆文联、广东省文联、福建省文联等共同主办的2023“濠江之春——澳门与内地艺术家大联欢”系列活动在澳门启幕。

本次活动为澳门同胞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各民族艺术特色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其中，新疆艺术学院师生带来的“新疆是个好地方”文艺晚会在民族歌舞《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热烈氛围下拉开帷幕。歌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取材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精美壁画创作的古典舞《铅华·满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得观众掌声雷动；荣获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金奖的作品维吾尔族男子群舞《阳光下的麦盖提》，以热情洋溢的舞姿表达了新疆人

民快乐的生活状态；还有独具特色的哈萨克女子群舞、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十二木卡姆选段……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澳门同胞充分领略了新疆艺术的独特魅力，增加了与澳门两地民间的厚谊，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情怀与担当。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入古开新·当代篆刻名家作品交流展”、佛山陶艺作品展、安溪藤铁工艺展同期在澳门展出。

走过十二载春华秋实，“濠江之春”各艺术门类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架起了两地艺术家相遇相知桥梁，推动了文化结缘和民心相通。同时，澳门文艺社团传承弘扬爱国爱澳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讲好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故事，向海内外展示了澳门的新发展新成就。

## 开启粤西唐诗之路研究的新视域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唐诗之路”是学术界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提出的研究唐诗新的学术增长点。日前，在第二届唐诗之路研究会年会上，广西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国学中心）主任、桂学研究院教授莫道才对“粤西唐诗之路”概念做了深入阐释。

莫道才表示，“粤西唐诗之路”是在“浙东唐诗之路”之后的新话语。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沈佺期、宋之问、戴叔伦、戎昱、柳宗元、李商隐、李渤等唐代诗人在贬谪、游宦粤西时都留下大量的诗作，形成了一条粤西唐诗之路，是唐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

近日，由莫道才编著的《粤西唐诗之路探源与诗人寻踪》作为“唐诗之路”研究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是一部粤西唐诗之路研究总结性论文集，收录了叶嘉莹、卢崎彦、陶敏、孙昌武等学者的15篇论文。全书分为三部

分：“粤西诗路与诗歌创作”主要讨论了粤西唐诗之路上的诗歌作品及其所反映的诗人情感、历史文化背景；“诗路诗人寻踪”主要考证了唐代诗人在粤西唐诗之路上的史实、行踪和遗迹；“粤西诗路丛考”考证了粤西唐诗之路的大致走向、遗迹以及诗路的文化。“《粤西唐诗之路探源与诗人寻踪》的出版将开启粤西唐诗之路研究的新视域。”莫道才认为。



《人民中国》创刊70周年纪念特辑掠影

一家之言

# 以人为中心的唐诗研究

陈尚君

最近十年来，应编辑朋友的邀请，我写了一些有学术意味的、面向大众普及的文章。其实，最开始，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学术普及，因为缺乏一些艺术的感觉。我的专业是唐代文献研究，20世纪80年代，我致力于《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的编写，对有清一代的全唐诗文献增加新作品，发现问题，并撰写文章进行考订，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以后的30年左右，我的主体工作是重新校订全唐诗，这是已故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的一个构想，也是他的遗愿，最近已经接近完成。但是，这样的文献工作是不够大众化的，与一般读者有距离。因为偶然的机缘，中华书局的刘淑丽老师约我写学术普及专栏，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没想到一尝试，发现原来自己还有一点能力，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在普及的同时，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学者，因此行文尽可能小心谨慎，

同时也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能力，尽可能用比较明白晓畅的话来表达。回看这些年的文章，也能感到自己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最初一个系列文章结集出版为《唐人佚诗解读》，即以最近100年新发现唐诗为叙述中心。从2019年以来，则以《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为专栏，每期写一篇，每年十二篇。这个题目是我自己想的，稍微有些“呆萌”，原因在于唐朝离我们很久远，我不可能认识这些诗人，但因为读过很多他们的作品，可谓“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便和他们走得很近。我想讲述的是唐代诗人的真实生活情况：他们经历了什么事件，遭遇了怎样的人生挫折，在困境中如何奋发图强，如何在作品中传达心声……

比如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裴度。在平定淮西的战役胜利以后，裴度在朝中的地位一时无两，旁人远看羡慕不已，但是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位极人臣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裴度和他的朋友来往之中，有很多闲适的、无聊的，甚至是琐碎的细节，从中可以读懂一个胸怀天下、位极人臣的宰相内心的不安和恐惧，以及他希望做成一番事业却又无所成就的感慨。

这样的例子很多，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地方，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诗歌，好或者不好，很容易评论，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放到它所处的

时代，放到诗人真实的人生中，就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个诗人都有活生生的人生，如果在文学研究之中看不到人，读不懂他的内心，不能理解他的欢喜和痛苦，那么与研究对象就存在距离。

以人为中心的唐诗研究，离不开长期唐诗文献考证的基础，同时，还需要文史融通的立场。文学和史学是对历史发展从不同立场展开的叙述，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包括他所有的经历，他所交往的朋友等等。置身于时代大环境中，我希望展现出每个诗人丰富多元的面貌。

我写唐朝诗人，受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关于传记文学理念的影响很深。朱东润先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者，他的传记和传统传记如《史记》等，非常不同，他既不讲古文笔法，也不讲互见法；对于传主既不是歌颂，也不是否定。他学习英国传记文学方法，认为传记文学作者应该超越时代，同时对于传主怀抱同情的理解——不把传主任意拔高，也不做脱离时代的贬斥，而是真切地理解传主在彼时彼地的真实处境与面临的问题。因此在《我认识的唐朝诗人》这本书中，我尽可能真实全面且生动地写出诗人一生之经历和故事，包括他的家族、他的交往、他的言谈、他的时代；或者写诗人生命中的某一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

片段，展现他这一时期的特别经历和精神面貌。写作中不做任何的虚构，也不做刻意的掩饰和拔高。

诗歌是诗人投入全部的热情和血泪留下来的记录，它是活生生的，它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古人说知人论世，言志缘情，今人讲真情实感，言为心声，这都是在努力追求准确地理解诗人，读懂诗歌。文学即人学，这也是文学的独特动人之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